

無錫農村

經濟發展的縮影

中共無錫市委政策研究室 編

紅旗出版社

中共無錫市委黨校

資料室贈閱



无锡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

中共无锡市委政策研究室编



红旗出版社

无锡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
中共无锡市委政策研究室编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兴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0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1,000册

书号：4160.024

定价1.00元

序 言

吴 建 国

我曾在无锡市工作过一段时间，对所辖江阴、无锡、宜兴三县和郊区的农村经济状况有所了解，尽管那时直接的接触面、观察面比较狭窄，而且多是“走马看花”，但还是留下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离开无锡还不到一年，现在又读到中共无锡市委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的关于无锡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查报告，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并再次受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题为《无锡农村经济发展的缩影》的小册子，是无锡市一九八四年度十六个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亿元的乡和另两个别具特色的乡，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经验的初步概括和总结。这些来自实践的报告，以翔实的、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事例，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现了无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龙腾虎跃的大好形势。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确是无锡农村经济发展现阶段崭新面貌的写照和缩影。这批材料，虽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经济活动的分析，但全书所包含的实际社会内容和意义，却远远超出了纯粹经济的范围。在我看来，“亿元乡”就不只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个具有多重的丰富内涵和规定的综合概念，它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所领导的农村经济改革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威力，集中地体现出了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难设想，

这两种历史能动因素的统一、结合，将会形成多么巨大的“改天换地”的力量。

列宁曾经说过，只有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内，才能理解、把握它的本质、规律、趋势和脉搏，这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绝对要求。研究考察无锡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方法论的绝对要求。当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处在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的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经济转化的历史过程中。这是我国农村所经历的又一场深刻而伟大的变革。这一变革，既是这些典型出现的背景，也是它的产物。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无锡农村，尤其是在“亿元乡”，其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据统计，一九八四年，无锡市农村乡、村两级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农村工农业总产值（不包括县属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一，而在“亿元乡”，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平均比重已经高达百分之八十六点零五。这一变化，可以说是无锡农村经济在“两个转化”的历史过程中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的标志。实现这一重大变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环节何在？在我看来，是乡镇工业的崛起。这是这些乡以至整个无锡农村得以繁荣的契机和关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乡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基本上都是走的以农业为基础，以乡镇工业为重点，并通过工业武装农业、发展第三产业的路子。这些乡的乡镇工业萌发较早。二十多年来，它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历了萌芽布点和发展提高的两个阶段。最初，它作为新生事物的价值，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所认识，甚至曾经遭到了种种责难和非议。然而，它的生命力是顽强的，不可遏止的。随着它的成长壮大，日益显示出了其在农村经济乃至整

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事实终于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它在前进中所出现的问题终于被人们正确地看作是新生儿在诞生时伴随而来的血污和烦扰。在最近一两年里，经过努力，这些乡的乡镇工业已经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在城市大工业和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的支持下，具备了有资金、有技术、有人才、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有协作关系、有市场的条件，开始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区域性经济中站稳了脚跟，进入了其发展史上的成熟起飞期。在这些乡里，乡镇工业已经再也不能与落后、陈旧或简单的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去相提并论、等量齐观了。在那里，已经出现了一批年值超过一千万元，年利润超过一百万元的企业。这些企业设备比较先进，技术力量比较雄厚，能生产出优质、高档产品，并通过其外引内联，带动了整个乡镇工业水平的提高。一九八四年，无锡市乡、村两级工业的总产值已突破了五十亿元，占全市村以上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五。事实上，乡镇工业已经成了城市大工业必要的补充和重要的协作伙伴，成了科研单位、大专院校转移科研成果，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成了开发边远地区和资源产地的一支生力军，成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在城乡经济网络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使它成了中心城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乡镇工业的发展，不断地给农村注入发展商品生产新的要素和活力。它不仅引起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而且还促进了农村各业的协调发展。在最近的几年中，无锡农村，特别是这些“亿元乡”，农副业生产的发展速度也很快。一九八四年，这些乡的农业总产值平均比上年增长了百

分之十三，副业总产值（包括生产队、联合体和户办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齐头并进的新局面。这是因为，这些乡在发展乡镇工业的同时，利用其提供的资金、物资，进行了多种形式的“以工补农”、“以工扶农”，调动了务农务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了对农副业生产的服务和投资，从而不仅稳定了农业这个基础，而且还提高和发展了农业，促进了农业自身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在这些乡里，农业结构正由原来单一的粮、猪生产朝着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生产和加工相互配套的立体型、生态型的大农业方向发展。粮食生产在农副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种植业、养殖业蓬勃发展，开始出现了品种多样化、优良化和规模经营、综合经营、集约经营的发展趋势。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多次增值和综合利用已经开始引起重视，一批很有前途的为城市服务为外贸出口服务的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正在形成。所有的这些都有力地说明，没有乡镇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农业的稳定，就没有农业在更高基础上的改造和发展，同样也就没有整个农村经济的昌盛。事实上，在这些乡里，乡镇工业已经成了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农村各业协调发展的主要杠杆，农民收入、集体积累和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

当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应该从实际出发，具体的形式、具体的途径可以而且也应该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沿着狭隘的传统农业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这并不是说，农业自身已经没有潜力可挖，而恰恰相反，农业自身的发展确实有着巨大的、无可穷尽的潜力。农业现代化的这篇

大文章还刚刚开了个头。问题在于，农业结构的调整及其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进程，需要资金、技术、人才。单就资金而言，在当前情况下，指望国家大量投资，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单靠农业自身的积累来搞自我武装、自我发展，也显然是不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对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来说，由于地少人多，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无论如何也不能为农业自身的发展所消化。而不解决地少人多的矛盾，把大批剩余劳动力转向非耕地经营，农村就无法摆脱八亿人搞饭吃的状态，因而农业的自身积累也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这些乡所走的以发展乡镇工业为突破口带动农村各业协调发展的道路，无疑是我国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两个转化”的必由之路。

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还有必要指出，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评价这些“亿元乡”所代表的无锡农村骤变的意义是不充分的。它的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还在于，“亿元乡”之路是实际地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达到小康水平，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有经济上的要求，又有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上的要求，也就是说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高涨。现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首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部分农村，包括在无锡农村的“亿元乡”表现得十分明显。通读全书，在这些乡我们不难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轮廓和雏型。

这种通向未来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其中心环节也是乡镇工业的发展。由于这些乡的乡镇工业的兴起，导致了农村劳动力构成的重大变化，特别值得深长思之

的是这样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即农村自身成了消化自身剩余劳动力的广阔天地，成了吸收、培养和造就新的工人阶级成员的大学校。到一九八四年年底，无锡农村已有六十六万四千七百人当上了乡、村两级企业的工人，占全市农村总劳力的百分之四十。而在“亿元乡”，这样的工人已占总劳动力的一半；同时，还有一大批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农民在实施“农工一体化”的过程中，成了乡镇企业中“农业车间”的农业工人。这批职工，有的已经完全与农业脱离了关系，成了真正的工人；有的还是亦工亦农，正在向工人阶级转化过渡。可以预料，乡镇工业的发展，必然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变为先进的产业工人；同时也必然会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规模，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工人。这一过程和趋势，最终无疑将会使工农差别逐步消灭，以至归于自然融合。与此同时，乡镇工业的发展，还在我们眼前绘出了另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就是作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小城镇的形成和星罗棋布。在本书所及的乡，都有城市或小城镇作依托，而且这些小城镇都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到了那里，真是今非昔比，当“刮目相看”。这是我国农村繁荣，城乡差别缩小的重要标志。尽管目前广大农村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刚刚起步，但比较先进地区所开创的前景，如“日月经天”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农村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所引起的这一变革，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特色。它不仅突破了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也阻断了资本主义那条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农民破产，农村贫困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中，曾出

现过“羊吃人”的悲剧。资本家为了办工厂、农场，借助强制手段，剥夺农民的土地，迫使千百万农民破产，成为发展工业的廉价雇佣劳动后备军。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建筑在广大农民巨大的苦难和牺牲之上的。然而这种悲剧，在如今中国无锡的农村却没有重演也不会重演了。这里的工业化过程，是武装和提高农业的过程，是不断致富农民，繁荣农村的过程，它没有给农民带来破产和苦难，也没有造成农业的凋蔽。无怪乎这里的干部群众把他们的伟大创举叫做“甜蜜的事业”、“带着微笑的转化”。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相伴随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但在“亿元乡”，我们看到的却是共同富裕，集体经济不断增长，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一九八四年，无锡农村的乡、村、队三级集体经济的总收入已占全市农村经济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九。近几年，这里的个体专业户和新的经济联合体发展比较迅速，但他们的发展是集体经济支持的结果，因而对集体经济的依附性也很大，并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不同形式联合的趋势。这种强大的日益发展着的集体经济成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坚实基础。无疑，在这些乡里，农民富裕程度在地区之间、个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并不悬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得到了较好的贯彻，社会主义正在显示其巨大的优越性。

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恶果，不仅在于农民的破产和贫困以及两极分化，而且还导致了城市人口的膨胀和畸型发展。而在这里，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也就是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从传统农业中分解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没有背井离乡，大批地涌向大城市，而是绝大部分留在本地，相对集中在小城镇。在这些乡里，农民用乡镇工业的利润，大力进行



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兴办教育、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福利事业。事实上，在这些乡里，一批具有现代化特色的中小城镇已经初具规模，成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中的结节点，也成了吸引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农村城市化，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正在沿着没有外在人为强制的“自然历史过程”趋于泯灭。

总之，从这些“亿元乡”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所带来的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的消除，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原则的真正切实贯彻和体现，看到的是二〇〇〇年中国整个社会主义农村的美好前景，看到的是中国社会通向光辉未来的道路。这是读了本书所获得的主要感受和启示。

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走向未来的路是漫长的，任何先进典型都有一个继续完善和发展的问題。无锡农村，包括本书所及的十八个乡，还仅仅是处在新的伟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上。它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种种新的矛盾和问題。比如，在速度问題上，决不能头脑发热，竞相攀比，特别是不能净想“一锹挖出个金娃娃”，而不顾主客观条件。更不能只注意发展乡镇工业而忽视和动摇农业这个基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否则，我们必将受到新的惩罚。此外，我们还要充分地调整“两个文明”建设的关係。必须看到，物质文明的发展，只是给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条件和基础。因此，物质文明上去了，决不意味着精神文明就会“水涨船高”，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应该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灵魂和动力。放松、削弱思想建设，就会模糊以致偏离我们的正确方向。

最后，有必要指出，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极大的不平衡性。这是自然的、历史的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的现实。这应该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基本立足点、出发点。因此，对无锡农村这些乡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具体经验和做法，不能作为模式简单地加以移植、套用。这一地区的特点是自然资源缺乏，田少人多，经济基础比较好，能工巧匠多，社会联系广泛，交通方便、紧靠大中城市等。所以不能“刻舟求剑”、“削足适履”，而要善于利用发挥不同地区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不要说不同地区，就是同一地区也不能照搬。事实上，本书所及各乡，他们发展路子尽管大致相同，但产品结构、行业结构有着较大的差异，具体的做法和对关键环节的把握也各有侧重。这就告诉我们，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既要敏锐地去感受把握和适应中国农村“两个转化”的大趋势，也要因地制宜，这就是我们从全书中应该得出的结论。

无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走着的道路，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我衷心地希望这些乡的干部群众能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作出更大的成绩，创造更多的经验，为完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七日

前 言

彦 久 师

无锡农村，地处长江下游、太湖之滨，位于沪宁铁路中端，历来就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人文荟萃之地。所辖江阴、无锡、宜兴三县和无锡市郊区，共有九个县属镇，二十九个国营场圃，一百二十一个乡，二千一百二十六个行政村。现有耕地二百九十二万亩，农业人口二百九十三万九千人，劳动力一百六十四万四千五百人。

近几年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无锡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力结构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初步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全面兴旺，乡、村、队、联合体、户各层次经济共同繁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头并进的生动局面。一九八四年，三县一郊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八十五亿二千四百万元，其中农村工农业总产值(不含县属工业)六十六亿四千三百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点一二，实现了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的第一个翻番。乡镇工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有了相当的规模和良好的基础，发展更为迅速。全市乡村、生产队、联合体、户五个层次的工业实现

产值达五十四亿五千四百多万元，增长百分之五十二点六，占全市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二。其中乡村两级工业实现产值五十一亿七千八百万元，实现利润（按上年统计口径）六亿五千万万元，上交国家税收三亿二千五百万元，支付职工工资（不包括超利分成）四亿七千四百万元，提供支农资金九千二百万元。全市农民人均年收入五百八十五元，其中集体分配部分四百四十元。

在这样的形势下，无锡农村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单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继上年的周庄、华士、前洲、玉祁、黄巷五个乡之后，又有西郊、要塞、青阳、堰桥、洛社、杨市、东峰、红旗、河埭、扬名、南站等十一个乡镇（以下简称乡）的工农业总产值超过了一亿元。这些乡，作为无锡农村商品生产在较高水平基础上进一步稳定健康发展的先进典型，为我们展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广阔前景，他们的发展经验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十六个乡，共有人口五十二万七千人，劳动力二十八万六千多个，在全市农村总人口和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均为百分之十七；耕地面积三十七万三千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二点七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在一九八四年，这些乡的经济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全市农村平均水平相比，它们的经济发展，具有下面一些特点：

一是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增长速度比较快。一九八四年，这些乡的农业都获得了创历史纪录的丰收，粮食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四五；副业（含生产队、联合体、户工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六十点三六；乡、村两级工业发展更是迅猛，总产值十八亿八千二百万元，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九点二九。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二十亿七千一百万元，

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七五，比全市农村平均增长率高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五。

二是乡镇工业比重大，发展基础比较好。这些乡的乡、村两级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点零五，比全市农村平均水平高百分之二十三；投放劳动力已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七六，比全市农村平均水平高百分之二十。一部分企业正在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平均每个乡有固定资产二千五百万元，自有流动资金一千四百万元，有符合年产值超过一千万元，或税利超过一百万元两个条件之一的较大规模的企业。

三是综合经济效益比较高，对国家贡献比较大。一九八四年，这些乡的乡、村两级工业利润一亿五千万元，增长速度比全市农村平均水平高百分之一百八十；上交国家税金一亿二千六百万元，占全市乡、村两级工业上交税收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六一，增长速度比全市农村平均水平快一倍多；职工人均年产值一万二千五百元，比全市农村平均水平高四千七百元；人均创利税一千九百四十六元，比全市农村平均水平高百分之八十一·三六。

四是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乡村面貌变化比较大。一九八四年，这些乡的乡、村两级职工人均年工资一千零四十二元，农民人均年收入七百六十七元，分别比全市农村平均水平多三百二十九元和一百八十二元。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购买力和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小城镇和新村建设面貌一新，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日益丰富多彩，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开始明显好转，堰桥、东埭等许多乡还先后被省、市评为纪律检查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单位。

上述情况表明，“亿元乡”不只是个纯粹的产值概念，

而是无锡农村经济协调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进入良性循环的综合标志。

那么，这些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势和局面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一些基本经验：

第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断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

六年来，这些乡的广大干部群众，不断地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冲破了“左”的和其他种种旧观念的束缚，把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坚定性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创造性较好地结合了起来，对完善能适应和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经济管理体制作了大胆的探索。

在完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中，他们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从集体经济比较发达、商品生产项目较多的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对各行各业实行经济承包，解决了比农业承包更为复杂的实际问题，并在一九八三年产生了以堰桥乡“一包三改”为代表的改革新尝试。“一包”，就是所有经济实体和经营项目全部实行经济承包，“三改”就是改干部“任免制”为“选聘制”，改职工“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工资“固定制”为“浮动制”。一九八四年，这些乡都参照堰桥的经验对本地的改革加以提高和完善，较好地解决了经济承包中不注意经济效益以及发展后劲的问题，处理好了干部选聘制中的上级聘用和群众选举、厂长(经理)负责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完善了职工合同制中的工人运用民主权利的制度，克服了工资浮动制中奖金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这些改革切中时弊，较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一大二公”，否认商品生产和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带来的弊病，调动了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从而加快了经济的发展。这些乡还改革了

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模式，采取有力措施实行党政分设、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积极引导农村经济朝多层次、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许多乡十分注意抓好村办和生产队办工业，使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还积极鼓励和扶持专业户和联合体的发展，培养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有些乡还通过精简行政管理层次和干部人数，实行农工一体化，扩大耕田和多种经营的生产规模等改革措施，建立新型的经营管理模式，从而提高了农村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

这一系列的改革，使集体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使经营的好坏直接与经营单位或经营者个人的利益挂钩，也使经营单位和经营者有了从事商品生产所必须具备的自主权，从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在国家计划经济指导下的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加上改革后的市、县、乡的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都不直接干预农村经济组织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只是进行业务指导、提供信息技术，开辟供销渠道、搞好物资调节，为城乡联合协作牵线搭桥等等服务。这就保证了这些乡的商品生产者既有较大的独立回旋余地，又能受到多方面指导和关怀。这样的经济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是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这些乡的经济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第二，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村经济结构，不断开拓农村商品生产的新领域。

这些乡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具体方式和途径虽然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基本道路大致相仿，都是走的以农业为基础，发展乡镇工业为重点，通过工业武装农业、副业，发展第三产业的路子，农村经济结构也已都从原来单一的种植业转变